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论丛

民营化 还是社会化：

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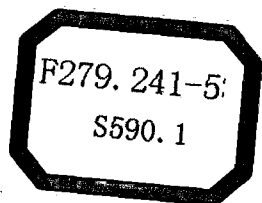
史正富 刘昶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41-5

90.1



8

复旦大学新政治



走向新的政治经济

民营化 还是社会化：

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

史正富 刘昶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史正富,刘昶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论丛)

ISBN 978-7-208-06833-9

I. 民... II. ①史...②刘... III. 国有企业—产权—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F279.2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4675号

责任编辑 李娜

封面设计 王晓阳

民营化还是社会化:
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
史正富 刘昶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
www.hibooks.cn
世纪出版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021-63914988)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毫米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171,000
版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6833-9/F·1556
定价 20.00元

序 言

史正富 刘 昶

众所周知,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已进行多年,既有成功和经验,也有反复和教训。改革初期,效率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各界的利益受到触动,于是,如何维护改革的公平和公正,杜绝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成了更多人关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2004年年中郎咸平教授对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批评一下子就引爆了一场全国性辩论。这场辩论一开始就越出了学术的领域,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其深度和广度为近年来国内所罕见。虽然参与辩论的各方对国企改革的是非成败各执己见,争论的焦点和核心始终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基本思路 and 战略选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召开“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2005 双年会”时,主题就定为“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与和谐社会的发展”。中、美、英、印度等国的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学者提交论文,到会交流,深入探讨了国企改革的广泛话题。本书收录的是与会代表提交的 15 篇论文。

本论文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美国得克萨斯 Austin 大学的 James Galbraith 教授和复旦大学史正富教授的两篇文章是本次会议的主题发言。James Galbraith 的父亲是美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 Kenneth Galbraith,以《新工业国》、《经济学与公共目标》等鸿文而名满天下,曾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James Galbraith 本人是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他为会议提交的文章题目很有意思:“在全球

2 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

化时代构建和谐社会”。文章的主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众所周知,所谓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市场自由主义主要是美国的产品,Galbraith指出它是“仅供出口,不供自用”的美国产品。它出口到东欧和第三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不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而在美国国内,由于政治过程中多种制衡力量的牵制,华盛顿共识式的政策从未推行。事实上,制衡能力是市场经济持续运行的必要条件。文章强调在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和压力下,各国政府和人民要让各种制衡能力发挥有效的作用:“如果市场倾向富有的城市,政府能否倾向另一个方面,偏爱乡村?如果市场偏爱南方,政府能否转向帮助西部和北部地区?如果市场倾向年轻人,政府能否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如果市场偏爱健康人,政府能否保护病人?”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Galbraith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国有企业的问题,但他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和对制衡能力的强调,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深刻观察和理解,对我们讨论国企改革战略极具启发意义。

史正富的文章“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化战略。长期以来,在国企产权改革的问题上,人们的思维定势基本局限在国有还是民营这种二元对立中。史文所建议的社会资本的模式则提出了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新思路。文章首先对现代企业的产权安排做了简短的历史回顾,强调不存在永恒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产权安排;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不同的企业环境与历史条件,要求不同的产权安排。就现代企业而言,所有权结构的长期趋势是股东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替身化,而不是私有化。欧美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古典私人家族企业逐步演化为基于多元社会资本的经济组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以中石油、中移动这类企业为代表的一批产业巨头式的国有企业;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这些国有企业的权益应由全社会共享。因此,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不是民营化而是社会化。

实现这一战略思路的核心是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变为三种形式的资本:其一,国有资产转变为社会资本,即将国企中的股权配置给

社会公共机构,使社会公共机构对这些产权行使控制、收益和处置的全部职能,使得企业的国有资产转变成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社会资本。其二,国有资产转变为国家所有的权益资本,即将国有企业的国家股权委托给资本管理机构进行专业化操作,定期进行终止结算,对委托期的产权增值,由国家和资本管理公司按合同规则进行分配。其三,国有资产转变为国家年金资本,即将国有产权出售变现为货币资本,再对可以带来固定收入的资产进行投资,从而使国家财政增加一项由资产产生的稳定的收入来源。

显然,上述这一国企产权的社会化转型战略不仅事关企业,而且直接牵动国家财政、资本市场、事业单位及非营利组织的培育发展,其实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性问题。

论文集的第二部分是对西方社会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观察与讨论,由陈平、刘昶和张磊的三篇文章组成。陈平的文章通过对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公司、美国大学联邦信用社和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之家这三个非私有企业的个案研究,挑战了产权学派认为只有明确界定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最有效率的观点,认为企业效率的核心不在产权结构,而在其他因素,如经营运作模式、经理选择模式、企业文化等。刘昶的文章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股权演变的历史为个案,对西方现代企业产权社会化的演变趋势做了分析,并讨论了决定和推动这种演变趋势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和力量。特别强调指出企业创新能力的竞争及其压力,是影响西方现代企业产权结构朝社会化方向变动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曾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担任投资管理工作的张磊则对著名的社会公益基金——耶鲁大学校产基金数十年来在金融证券市场上的成功运作做了介绍。

论文集的第三部分是对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经验教训的探讨,由七篇文章组成。张晖明的文章对国有资产的定位及管理提出了新的重要思路,认为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定位应该是社会性、基础性和公益性,并发挥引导和调控作用。国有企业应尽可能退出一般性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竞争性行业,而集中于负有特殊社会目标的产业,特别是难以由非国有企业来实现重要社会目标

的领域。在国有资产的管理方面,文章提出了建立国资委、资产经营公司和国家出资的企业这样三层次的国资管理体系,并通过市场化契约式委托代理和授权经营来运作国有资产。国资运作要从资产存量转变为资本流量,以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实现国有资产价值的最大化。

陈伟恕是著名的上海实业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他的文章根据自己多年在大型国企工作的实践经验讨论了大型国有企业的激励制度。文章首先指出企业的激励制度包括两类,事业激励和报酬激励。并强调对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来说,事业激励是其本质所在,也是其优势所在。在事业激励方面,有组织平台、领军人物、企业文化和领导制度设计四个重要环节。文章接着讨论了大型国企中报酬激励的各种安排和设计。文章不仅回答了国企激励制度的许多实践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人只会斤斤计较于物质利益计算的假设,指出了在特定的情况下,事业激励可以比物质激励更重要。

赵世勇和周忠明的两篇文章从博弈论和信息论的角度讨论了国有企业在经营者选择和公有产权转让问题上的困境。赵文通过分析指出,目前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这种制度安排既无法保证官员在企业正常经营状况下有积极性去“任人唯贤”,又无法保证官员在现行体制约束下识别出候选经营者的能力,并且也无法正确地考核现有经营者的能力。所以,无论是从政府官员的主观愿望上来讲,还是从其客观约束上来讲,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安排都无法有效地解决经营者的选择机制问题。要有效地解决经营者的选择机制问题,就必须将企业的最终控制权转移到真正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出资人手中。周忠明的文章则强调在公有产权转让过程中,由于公有产权持有人不属于真正的“经济人”,缺乏有效约束,因此公有产权的转让不能实现最优配置,公有产权的配置效率可能出现损失。虽然进一步的市场交易可以改进配置效率,由于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配置效率的损失是不可忽视的。对此,应当加大产权交易的信息披露,提高市场交易的透明度,制定强制性交易规则,增强对交易人的

约束,规范市场交易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以最大限度地改进公有产权转让的效率。

崔之元的文章通过对几个具体案例的讨论指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舆论监督和对舆论监督的法制保障的重要性。文章强调为保证我国的企业改革真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而不沦为少数人一夜致富的手段,非常需要社会舆论对改制过程的监督。我国的法院也应寻求对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的保障与对名誉权的保障之间的平衡,不能因部分报道失实之小而失舆论监督之大。

王炼利的文章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讨论了国企改革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和弊端。文章的重点也落在了经营者选择的问题上,认为在现有体制下,中国不存在出于自身利益为国有企业寻找经营者的机构。对于任命国企经营者的政府官员来说,国有企业能盈利固然好,不能盈利的话,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况且对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的辨别是很专业的事,这不是政府官员的专长。文章指出应该让国企的职工有选择企业经营者的发言权,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与企业经营业绩休戚相关,而他们也真正熟悉和了解企业。但现有的国企管理框架里却没有他们发言的地位。

张军和蒋星的文章则对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讨论做了一个全面和扼要的回顾。这篇文献综述对我们了解国企产权改革的各种理论观点和主张非常有帮助。

论文集的第四部分是三篇由国外学者提交的论文。一篇是讨论印度公营部门私有化改革的,另外两篇是讨论如何控制和防范金融欺诈和舞弊的。C. P. Chanderasekhar 的文章指出印度公营部门的改革几乎完全集中在出售公营部门事业的股票上。为了出售公营部门的股份,政府做了大量的让步,但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并未达到政府预期的目标。一方面,公营部门的资产在转让过程中普遍被低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政策的让步,股权转让导致企业控制权的丧失,私有企业以较低的控股权就能实现对大型公营企业的控制。因此,印度公营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做法值得重新探讨。Jack Blum 和 William K. Black 的两篇文章讨论的是控制和防范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经济中的金融欺诈问题,虽

然文章与国企产权改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都强调指出要有效防范金融欺诈,就必须摒弃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这对我们思考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在国企产权改革问题上虽然观察分析的角度各不相同,提出的观点主张也旨趣互异,但大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却有着相当的共识。首先大家都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有高度的共识,其次大家对国企改革全盘民营(私有)化、市场化持相当的保留态度,虽然程度有所不同。我们相信,这种共识并不只是这次学术研讨会上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思想界和全民、全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在目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面临新的战略选择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本论文集的出版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凝聚这种共识。有了这种共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就有继续进行的充分动力,就会得到足够的社会关注和监督,就一定能走出一条既体现效率又实现多赢共享,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成功之路。

对于本论文集的出版,我们首先感谢所有参加2005年6月“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与和谐社会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代表,除了本论文集收录的文章外,印度尼赫鲁大学的Jayati Ghosh教授、香港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Stephen Green博士、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部主任胡汝银博士也在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但因各种原因他们的论文未能收录在本论文集中,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和抱歉。我们还要感谢给本次研讨会投了稿,但未能参会的学界同仁和朋友。复旦大学的许多学生参加了我们的研讨会,他们在会上的提问和讨论有助于本论文集作者对自己论文的改进,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对研讨会的大力支持。感谢王文敏、王志红等为研讨会所做的大量后勤工作。本论文集的所有英文文章都是由石敏译成中文的,我们感谢她的出色工作。感谢王小卫博士为本论文集所做的初步的编辑工作。我们特别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何元龙先生对出版本论文集的一如既往的支持,感谢上海世纪高教图书公司忻雁翔、李娜等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目 录

序言	史正富 刘 昶/1
在全球化时代构建和谐社会	James K. Galbraith/1
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	史正富/8
私有制的神话和多种所有制的现实	
——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公司、美国大学联邦信用社	
和 MIT 学生之家的经验及启示	陈 平/26
从福特公司的个案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演变.....	刘 昶/37
从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成功看美国机构投资的运行.....	张 磊/50
探寻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之道	
——从上海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引发的思考.....	张晖明/63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激励制度:实践要件及其难处	陈伟恕/94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机制与效率的背离	赵世勇/105
公有产权转让的有效性	周忠明/123
改制,职工权益,舆论监督与社会稳定	崔之元/135
对工业企业改革的反思:1994—2002 年	王炼利/143
为什么要变更国有企业的产权	
——一个文献综述	张 军 蒋 星/155
投资缩减和印度公营部门改革	C. P. Chandrasekhar/169
主权、全球化与国家金融活动的失控	Jack Blum/177
监管欺诈与美国储蓄信贷银行的崩溃:	
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得到错误的教训 ...	William K. Black/182

在全球化时代构建和谐社会

James K. Galbraith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座教授

就某些方面而言,全球化已经是既成事实。对交通、通讯、新技术传播和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变化,你不能说赞成或不赞成,除非作为一种感情的表达。公共卫生和环境领域的全球化也是事实。我们可能出于担心而设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是全球化问题,这也是事实。

全球化的事实发生在技术、生物、地球物理等领域。在全球化时代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把全球化视为既成事实来对待,作为既成事实来处理。我们很难处理全球变暖这个问题,除非把它作为一项全球化的既成事实。艾滋病、石油开采过度、渔业资源枯竭等类似问题也是如此。

然而在其他方面,全球化这个词被用来描述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安排,这些安排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它们也不仅仅是事实,更可被视为规则或某些人认为必要的全球经济秩序。我们可以把自由贸易、资金自由流动、浮动汇率、对企业私有化的偏好,以及对放松管制或无管制的市场的偏爱都归到这一类。

这第二种对全球化的理解由偏好而非事实构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对全球问题抱持适当怀疑精神。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代表着社会最优安排。而且,我们必须依靠发生在现代世界和国家的真实经历来作出判断。如果证据指向其他方向,我们应该遵循证据的要求,而不是规则。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让我假定有两种互相冲突的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传统识见。其一被人们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大多数人非常熟悉。我前面已经提过,这种看法偏爱自由贸易、开放资金市场、浮动汇率、私有化、对市场管制放松、预算平衡和稳健货币。华盛顿共识的组织原则自然是新古典市场中竞争条件下的供求平衡。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到“市场是美妙的”,如哈佛经济学家 Claudia Goldin 所宣称的。

其二是我父亲在《美国资本主义》(出版于我出生的 1952 年)一书中探讨的概念,即抗衡能力。在这里,主要的组织原则不是供求,而是抗衡——可称为阴阳,即双方为维护社会结构而互相制衡。

在 1952 年的美国,我父亲强调了自由劳工联盟对大产业或大公司权力的平衡作用。今天在美国,联盟的作用已经消退了,但是抗衡能力的原则仍然有效。政府、立法机关、检举机关和法院可以通过政治程序在公众中解释该原则。最基本的是要通过多种有效合法的机制途径缓和社会冲突,表现并进一步发展社会价值。

稳定总体有效需求的凯恩斯原则比许多人通常意识到的更接近于抗衡能力。稳定的需求在华盛顿共识中只是被作为一个前提。但是在抗衡能力作用下,只有特定的制度机制能达成这一点,在特殊情况下有没有效果还不一定。有些机制是自动的,其他是任意决定的。有些机制牵涉到列在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其他牵涉到列在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但是基本原则是效应抵消:稳定性要求某些制度引来的波动被其他制度带来的波动抵消。

我没有正式的证据,但是我现在要断言,过去 25 年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华盛顿共识的应用是一场灾难。情况最恶劣的是在非洲引起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体系前所未有的崩溃,更不用提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内向爆炸,甚至连布什政府都作出债务减免的决定。在拉丁美洲,衰退不是 10 年,而是 20 年,政治上的不满导致所有国家在政治上向左转,阿根廷前些年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现在却无力还债。在苏联和东欧大多数国家,休克疗法引起工业体系崩溃,教育文化卫生体系瓦解,大面积贫困和预期寿命显著下降,老年人

受害尤其大。

但是,要证明华盛顿共识失败,最简便的方法是看看它最坚定的支持者是怎样为这条全球化途径辩护的,例如世界银行的 David Dollar 博士。有人要 Dollar 博士举出全球化最成功的例子,他举出了哪几个国家?是中国,越南,以及乌干达。我们下面看看他举的例子是否正确。

但是首先让我们看看华盛顿共识这一教条发源的国家。即使在今天,美国就是市场经济了吗?或者华盛顿共识贴了一个标签:“仅供出口——不供自用”?我已就这个话题写了很多文章(如你们所料)。我的发现是,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私有经济——接近一半,或超过一半——与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支持相关,国家支持通过预算、税收体系、财政担保和其他机制起作用。

在卫生部门是这样。美国 15% 的 GDP 花在这一产业——8% 通过公共预算(老年人保健计划、穷人医疗补助计划和老兵管理局)支出,剩下的 7% 通过私人保险的形式支出,由雇主或税收支持。

高等教育也如此。它消费了美国 2.25% 的 GDP,一半通过公共途径支出,一半通过私人途径,达到欧洲国家的两倍。住房也如此。美国 75% 的住户拥有自己的住房,由 30 年减税保险按揭贷款偿付。浮动利率的长期贷款减少了借方的风险,政府建立、准公共机构管理的二级贷款市场几乎消除了贷方的风险。越来越多的是,这些贷款以对房产作出的上升评估作担保,为私人购买耐用和非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弹性资金来源。养老基金也是这样。养老基金通过社会保障系统,付出一般代价使所有老年人口都能得到最低生活需求。美国 40% 的老年人除养老金外没有其他大收入,60% 的老年人的生活费一半靠社会保障。

以上所述各经济部门仰赖软约束,如果不说是完全没有受到创造利润的压力,它们也直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国家支持。这保证了美国消费需求的稳定——不用总靠公共预算赤字来满足有效的凯恩斯主义的考验。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在充分就业下还有财政盈余。这是怎样达到的?因为私有公司和家庭愿

意提前消费——公司是由于对技术发展浪潮抱有乐观，家庭主要是贷款买房。

还应该加上一点，需要时，美国财政政策反应非常迅速，采用的政策也在短期内非常有效。20 世纪 90 年代低利息率应运而生。2000 年后，财政态势上也有大转换——达到 GDP 的 6%——帮助总体经济度过了总需求惊人的下跌带来的危机。

除军事工业外，美国没有制造业产业政策。考虑到以重复实行紧缩货币和高估美元政策为特征的商业周期管理模式——倾向金融，不注重制造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形的结果，就是衰落的城市，力量下滑的工会，以及贸易赤字。这也不是自由市场。这是特定政策可预测的结果，可以说主要（但不完全）是共和党实行的政策，目的是对付民主党的劳动者基础。

令人惊奇的不是与中国的贸易赤字，而是双边贸易逆差——开放贸易在很大规模上造成的双边贸易不平衡事实。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地球引力模型揭示了部分答案：中国很大，其贸易额应与其广大人口和日益增长的收入成比例。但这不是全部原因。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大一统、稳定、和平——由此为发展商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但这些也不是全部原因。

中国的体制结构，尤其是它的社会主义传统，与中国当前的成功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化。但是现在它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吗？我认为在一个重要方面它还不是。资本资产市场的发展相对缓慢，因此市场份额的竞争主要在价格和质量上，还没有普遍在美国实行的那种竞争方式，即买下竞争者，关停竞争企业（有其他可以解释中国存在众多商店的原因吗？更别提众多的航空公司了）。

公司竞争的结果肯定是低利润，对消费者而言则是价格持续下降中选择越来越多。这是供过于求的经济。只要能不受损失的影响，这种经济就会持续下去。不受损失影响的当然是高比率的资本形成总额，由愿意承担事后贷款损失的银行融资，由各级政府支



持——市级、省级以及中央一级——政府愿意为达到具体发展目标而承担负债。其结果随处可见。

同时,大路货、公共品和公共交通(也包括低房租,尽管有些正在上涨)让低收入的普通城市居民可以容忍目前的生活水准——生活水准比容忍要强一些。最后,国家的对外需求——以及众多厂商的利润要求——通过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满足。就关系到竞争力的外部条件而言,工人收入低。但是,事实上工资不低,而且正在快速上涨。

我父亲在《美国资本主义》一书中的开头观察到:“理论上大黄蜂根据空气动力学及其翼载是不能飞的。大黄蜂能飞,挑战了牛顿和奥维尔·莱特的权威,但它飞的时候总是让人担心会掉下来。”关于大黄蜂,他写道:“是一种能飞而又飞不稳的昆虫。”

美国过去真实的情况现在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公式——也许是经济发展史中最成功的一页。但是它并不符合华盛顿共识。有人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是典型的竞争市场经济,这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中国在定义资本主义的地方——即存在资本资产的有效市场上,没有实行资本主义。

如此说来,我们可以说中国由于缺乏充分发展的管制和有利的自由贸易联盟,对市场的抗衡能力正源于市场结构的不完善。国家在单一社会主义下无法繁荣,也在完全单一的资本主义下无法繁荣。但是,结合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市场联系,国家跌跌撞撞地采取了一种有效的抗衡方案,比理智的方案更好。

总的结论是具有有效抗衡能力和补充经济制度的系统比采用典型单一制度的更成功。向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资本资产等各个领域发展的无管制市场——主流经济理论的理想状况——更不能和前者相比。

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美国和中国模式能持续多久?美国正在诸多实践前沿经历一次严重的核查和制衡的侵蚀,包括:

正在进行的削减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的努力,而削减的是用于提供教育和其他重要服务的财政项目。

提供给家庭的贷款，这些贷款可能已经接近家庭经济能力的极限，但是金融机构愿意给他们扩大信用。

——对公司诚信深层次的腐化。这源于政策对公司舞弊行为监管的放松，以及高级政府官员与舞弊公司的政治联盟。当财务上诚实的企业不能支付资金市场要求的高回报率时，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竞争的大气候。

——针对法庭公正和独立的系统攻击，更别提对国会的了。

——令人遗憾的军事主义的深化，这反映了由对抗的升级最后演变为暴力的军事力量的局限。

有人因此担心在制度性萧条背景下美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担心预算赤字这些事情吗？一点也不。我担心贸易赤字吗？并不特别担心。因为，对我来说，这反映了国家之间（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尤其是和中国之间）一种正在进行的迄今为止运行稳定的互补机制。只要互补机制延续，赤字就会存在。可能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了。

很多人争论说问题是关于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偿付力，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银行只会在管制者要求或维持公众信心时在技术层面上达到偿付力要求，生存不依靠偿付力的银行存在其他问题：它需要更理智判断贷款的标准。但它本质上还是可以持续营业。只要银行能确保继续获得存款和储备，它就能继续从业。

对公司来说也同样正确。当然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资本主义公司并不如此，因为评级机构能把其债券变为垃圾。但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评级机构，为什么中国引进评级机构会由此招来问题总让我难以理解。

把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私有化是多次试用过的实践，主要有两个结果。明显不能挽救的公司，对它进行资产剥离是确切的。在企业具有潜在垄断力量时，典型的例子是公用事业、交通和银行，私有化企业会导致企业利用垄断力量损害公共利益。在这点上，我从不公平研究中得到的证据是明显的。每一种情形下，包括 1994 年后的中国，我们发现银行、能源和交通的收入相对上升，而制造业、农业和贸

易的收入相对下降。

进一步扩展我的论点,中国现在的持续发展问题主要是中国能否在动态的背景下让抗衡能力发挥作用。如果市场倾向富有的城市,政府能否倾向另一个方面——偏爱乡村?如果市场偏爱南方,政府能否转向帮助西部和北部地区?如果市场倾向年轻人,政府能否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如果市场偏爱健康人,政府能否保护病人?为保持以上这些抗衡的可能性,中国必须首先保留管制权力,控制它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不这样做就冒着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风险。由此,在社会领域中进行相机抉择的能力下降。这以前在俄罗斯发生过,在中国也存在这种危险。提倡完全放开门户的人没有证据说完全开放对国家更有利。那些人不能得出完全开放这一论点,因为事实真相并不是如他们所言。

很明显,前面问题上的压力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反映了中国正在延用没有抗衡限制的单一公司力量,而这正是美国的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坦白地说这是我们要抵制的。确保经济持续发展的实用方法不是为追求理论的理想状态而推翻现存机制——尤其不要使用实践中效果不佳的方法。我们应采用的实际方法是明确识别、保留将对未来的成功起基本作用的制度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对我们两个国家而言是很好的规则。即使美国违背了这一规则,这对中国还是适用的。

(石敏 译)